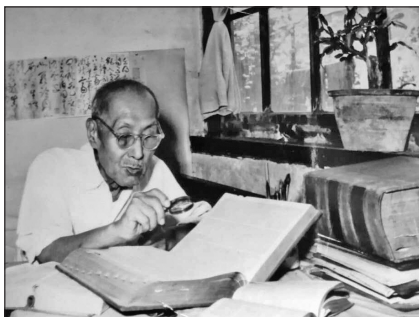


从《螺君日记》说起

——纪念父亲毕树棠先生诞辰 120 周年

○毕可绣 毕可纫



毕树棠先生在工作中

2014年元月，海豚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毕树棠先生的一本书，内容是1944年父亲以“螺君”为笔名在北京的《艺文杂志》发表的一组日记，名为《螺君日记》。编者赵龙江先生在《出版说明》中详细地讲述了他发现螺君、关注螺君、寻找螺君的过程。书中有中外文人学者的往来轶事、国内外文坛动态、图书评论以及作者的真知灼见。赵先生的心愿是出于“对这位校龄六十多年的老清华人的敬意，为保存文献，使文坛史迹不致湮灭，把这部日记重新排印，以广流传，让更多人知道并记住这位文坛前辈”。作为子女，我们非常欣喜父亲的作品现在还有人重视并出版。当时父亲已逝世31年矣！在他老人家今年诞辰120周年之际，衷心感谢赵龙江先生及海豚出版社的辛勤劳动！

父亲一生著作颇丰，20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，他的翻译工作始于1922年，作品

大多发表于《晨报》副刊。解放前的作品很多散见于30至40年代的报刊杂志中，大多散失了。现在发现的有他的散文集《昼梦集》、译作《贼及其它》《君子之风》《不测》《一夜之爱》等。解放后翻译和出版了马克·吐温的长篇小说《密西西比河上》，可谓他的代表作。解放后，他以翻译为主，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副刊等也有文章发表。父亲的笔名较多，有“碧君”“忧民”“犹民”等，但从未听过“螺君”这个笔名。

《螺君日记》原发表于1944年，收集的是1932年到1941年的部分日记，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的轶事。当时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想想“螺”的形象，其特点是永远把壳驮在身上，壳是它的家，它永远是背着壳蠕动前行。这多么像父亲的人生形象。他是家中长子，20岁师范毕业后，就担起了家庭重担。他想上大学，家里穷，等着他早日挣钱养活父母兄弟，只能望大学门而兴叹！家，给了父亲沉重的负担，也给了父亲奋斗的力量。他自幼刻苦读书，在济南第一师范学习时，他业余时间进补习班学习英语，仅三个月即入门，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刻苦自学。凭借这门学问，1921年他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，在处处用英语的清华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妈妈说：“你爸爸靠三个月的英语吃了一辈子。”父亲曾说，他到

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到时馆长不在，留给他一张字条，是用英文草书写的，内容是他今天的具体任务。这就是一张试卷，看错一点，这一天的工作就会出错误，这份工作可能就会丢掉。父亲激动地说：“清华这饭碗我端得真不容易啊！”

父亲酷爱文学，心高志远，在师范读书时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，第一次给他的报酬是几本杂志，以后他一发不可收。因为喜爱，他读了《左传》就决心写散文要超过《左传》；因为家里需要钱，他就写文章去挣钱。他说“山东老家的轶闻奇事都被我写出来换饭吃了”。他的书桌前挂着两个人的相片，一个是周总理，一个是契诃夫。父亲说，周总理是他最崇敬的政治家，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，他以他们为榜样。

大约20世纪30年代，《宇宙风》杂志介绍系列作家，其中有父亲的相片和他的手迹。那是马致远的词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孩子们把相片和手迹合成一幅挂像，我们兄妹每家有一幅，都把它挂在书房里。这首词反映了父亲的人生，浸渍着他内心的苦闷。他向往的是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幸福美景，面临的却是灰色生活中的断肠人生。曾经有人向领导告状说父亲在上班时写稿子挣钱，父亲在日记中说：“我上班从不办私事，我把阳光都留给了公事，留给自己的只有月光。”他每晚辛苦劳作，甚至通宵达旦，早上洗洗脸又去上班了。妹妹可纫说：“儿时每次夜里起来上厕所，总看到父亲在灯下写作或是在房中搓着手走来走去，那时我以为爸爸不会睡觉。”妈妈说：“你爸爸是生铁做的

人，不知道累。”每每看着相片和手迹，细品父亲一生的苦涩，情何以堪！

抗日战争期间，父亲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去西南联大，被校方确定为校产保管员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守望者。父亲日记中记载：1937年8月31日，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。1939年春，日本陆军野战军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，图书馆变成了医院本部，馆中约30万册图书都被日军军部掠走，图书设备荡然无存。接之而来的是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，我们家当时老的老小的小，全家13口人的生活顿时陷入极困之境。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父亲到伪教育部任职，他坚辞不就，只能蜗居北京城里忍辱抗争，以一支笔养活一家13口人的生活。在这期间，他在天津《民国日报》做主笔，在中国大学、辅仁大学任教或在中学教中文，同时写作。在这期间，爷爷和小叔也先后病故，可谓雪上加霜。

俞平伯先生因家庭的关系也未能随校南迁，在北京城里和我家住的炒面胡同相距很近，两人过从甚密，经常晤谈，互倾积悰，竟成莫逆。1938年他举荐父亲到中



20世纪40年代清华复员后毕树棠先生（2排右4）与朱自清先生（1排右2）和图书馆全体同仁

□ 怀念师友

国大学国学系讲授“欧洲文艺思潮”。在我家生活极其艰难之时，俞先生以每月50元的高薪请父亲给他的孩子做家庭教师。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，的确是雪中送炭啊！我们曾听妈妈说，1942年爷爷病逝，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俞平伯先生的父亲——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爷爷主持并亲笔点主，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。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家庭这个螺壳压得父亲心里太苦啦！他咬牙让自己坚强。父亲对可绣说，年轻时很自信，面对重重困难就像一座大山，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用肩膀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扛过去，追求那美好的生活。

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，父亲重回清华大学，承担了大量的复员工作。当时父亲受命先行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。他与同事们一同拆除日军的遗留物，找回丢失的大量被掠图书，接应西南联大迁运回来的图书。1946年10月图书馆重新开馆。在当时开放的各部门中，最盛的是图

书馆。北平解放之初，父亲以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身份受到周总理和董必武的接见。1949年7月，父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，应邀出席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接见。

父亲埋头于清华图书馆工作50余年，撰写大量中外书刊介绍，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新闻和世界文坛动态。他为人谦诚，学识广博，得到清华许多名教授的礼遇。陈寅恪和吴宓常因一些学术问题与父亲来往密切，甚至求助求教。上世纪30年代初，吴宓兼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编辑，他特约父亲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。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期间，邀请父亲到文学院主讲“小说选”。俞平伯将他的著名长诗《遥夜闺思引》的手抄本赠予父亲，并请父亲为此书写跋。

有人说父亲是“馆员模范”，是的，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道的专业水平，广博的各科学识，超常的外语能力，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，对图书馆的爱，对工作的爱，对人的爱。所以，每当青年教师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及专业学习中遇到问题请求帮助时，父亲总能信手拈来并拓展分析讲解，使求助者受益匪浅，因此父亲在清华师生中享有“活字典”的美誉。季羨林先生在《温馨的回忆》一文中说：“我在校时，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，胸罗万卷，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，听他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，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，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。”父亲背负着“螺壳”从未懈怠，尽管如此，对于我们子女，他是身教多于



20世纪40年代毕树棠先生（前排左3）和张子高先生（前排右3）与图书馆全体同仁

言教。他很少耳提面命地教导我们，只以他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影响着我们。1949年大哥毕可权在清华地下党的影响下，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父亲坚决支持，瞒着爱子心切的母亲送子参军，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其他兄妹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崇敬都从事了教育工作，秉承父亲的精神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的

贡献。父亲终于从螺壳中走了出来！晚年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亲爱的父亲，你背负着螺壳孜孜以求，走过了83年的历程，一只笔养活了父母兄弟，培养了6个孩子，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，走进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校史展览馆。望着“螺君”这个笔名，泪眼婆娑，谨以此文告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以启迪后辈追求更加辉煌的人生。

2020年6月17日

冀朝铸：红墙翻译的传奇背影

○宋春丹

冀朝铸一直执着于澄清一张照片。

那是1972年2月21日，尼克松走下专机，向周恩来伸出手。周恩来迎了上去，冀朝铸也马上跟了上去，知道自己不能离得太远，也不能站得太近。他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经典：“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。”这个历史瞬间被定格在世界各大媒体上。但在《人民日报》当时发表、后来为国人所熟知的那张照片上，他的形象却被P掉了。

这如同一个隐喻，就像他若隐若现、忽上忽下、至关重要而又模糊的存在。

“冀朝铸是外交部翻译圈的标杆和榜样。”曾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、出任过中国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告诉记者。

张援远1972年进入外交部实习，在食堂第一次见到身材高大的冀朝铸。当时外交部存在英音和美

音之争，冀朝铸是为数不多说一口漂亮美音的人，学英语出身的张援远非常喜欢，深受影响，自己也说了一辈子的美音。

他说，冀朝铸知识渊博，外语出奇流利，为人充满自信，说话声音洪亮，不用麦克风，很受听者欢迎。而一般来说，翻译说话声音都比较小，这也是领导人喜欢用他翻译的原因之一。张援远认为，这是



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冀朝铸（左4）担任翻译